

黄永玉：时代中的艺术标杆

□陈履生

“这个世界因为有了黄永玉先生，我们感觉到了精彩。我们也感受到因为他的离去，属于他的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在怀念他的时候，看看天上飘动的云彩，那种变化万端，正是他的艺术精华之所在。”



尹夕远 摄

黄永玉先生的离世，标志着属于他的那个时代的结束。

那个时代是大师云集、风起云涌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中，他的特殊性是因为其学历和经历，是因为他在创作中的突出成绩。尽管他和同时代的许多画家不同，没有参与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革命历史主题的创作之中，也就没有了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代表作。可是，他用独特的方式表现了与这个时代的关系。自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起步的黄永玉先生，从出身和学历比较低微的学徒工开始，进入到漫画和版画的学习和创作之中。始于漫画和版画的创作表现出了与那个时代的紧密关联，可是，他身上没有标签。他的版画不同于在鲁迅旗帜下成长起来的那一批青年，也不同于从延安和解放区走出来的有着革命血统的画家，而是用自己的方式标注了在这个时代中的特殊性。然而，他沐浴着新兴版画运动的晨曦，也感受到版画时代性的阳光。所以，1949年创作的《劳军图》用横卷的方式和装饰的手法，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传统的白描风格在时代中的风采。而这样一种反映时代主题的创作，表现出的是他所擅长的幽默以及对于造型的追求，是不同于同时代版画家的另外一种神采。进入到50年代以后，那些从延安出发跨入到新中国的版画家，开始了版画在新中国的转型实践，而黄永玉先生基本上没有这样一种转型，他依然故我地延续着自己的方式，并以《阿诗玛》插图一鸣惊人。相对应的是很多版画家还在艰难和艰苦的转型中，他却非常自如地将自己习以为常的对于美的追求，转化为新中国所需的美的表现，这之中没有将投枪、匕首转变成时代颂歌的变化，而以美的表现丰富了时代的百花园。他的好学和勤于思考，丰富了他的艺术内容，并以在时代中的独特性成就了他在版画界的独特地位。

他很快又从版画进入到彩墨画的创作之中，并以《猫头鹰》成为一个时代中的热点。他好像与生俱来就是有话题、有争议、有争议的艺术家。正好像过去的表现一样，他的每一种转变都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其中究竟是不是“国画”的问题，对他来说

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把画画好，画出自己喜欢同时也为大家喜欢的画。这如同2023年初兔年邮票的设计一样，他把握住了审美中的一些关键，也能了解到公众对于其艺术的期待，因此，他把自己的幽默持续进行到近百岁的艺术发展的路途之中。他不断在变，不断有新的花样。然而，他在每一个时期的悄然转变都是在一种自然的状态之中。50年代为中国革命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大厅创作的《各族人民大团结》大型壁画，其风格正是在漫画和版画基础上的转场，通过装饰性的语言，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时代中壁画的代表作。《各族人民大团结》以新的装饰性的语言开创了属于新中国的装饰绘画，所用传统的粉彩贴金的技艺，与造型、色彩以及装饰方法的灵活运用，吻合了时代的审美需求。黄永玉先生从老一辈艺术家那里传承了能够适应这个时代需求的一些表现方法，显现出了他的不同寻常。

黄永玉先生用有着自我艺术风格标记的艺术语言与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趣味性的表现以及所擅长的丰富的内容，在他的作品中不断延展到很多领域，从第一猴票的一炮走红到酒鬼酒瓶的设计，从雕塑到紫砂、玻璃，从诗歌、散文到小说……它们都诠释了什么叫才情和智慧，什么叫融汇贯通。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他都在把自传体小说不断往前推进。遗憾的是，人的经历毕竟有限，他高难度地构造了一个自传体小说完整的发展脉络，让人们看到了他和时代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也显现出他超强的记忆力。其中，很多细节的

描绘，是值得慢慢去品味的。

80岁前后居住在北京万荷堂的黄永玉先生倾心于表现荷花，人们看到了他与荷花的非同寻常的关系。十万荷花入画图，在不管画幅大小表现荷花的诸多作品中，他都能让人们感悟到荷花的品格和精神以及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一直到90岁以后，他还画了巨幅的白描荷花，表现出难得一见的深厚功力。他就是这样，不断用自己多方面的才华为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中国美术的发展标志着他的独特存在，诠释了它与时代美术之间的关系。

黄永玉先生不仅有独特的艺术方式，还有独特的生活方式。他非常自如地生活，又非常自如地驾驭着自己的时间，画自己想画，写自己想写，说自己所想说。他“明确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他不管从事文艺的哪一个方面都能有所成就，而且都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和称赞。正因为如此，他名满天下，这也成就了他对社会的贡献，对这个时代文化史和艺术史的贡献。他是时代中的特别个案，集多方面的才华和成就于一身，他在各个艺术领域都能做出让人感叹的贡献。他在不断变换角色的过程中，在不同的领域内，让人感受到一个人的经历、一个人的才华、一个人的创造、一个人所有的一切。人们喜欢他，也可能是有很多方面。作为比我老的老头，他从塞纳河到翡冷翠，从凤凰到万荷堂，每一方面都足以让人们感受到他给我们带来的美好，带来的愉悦，带来的属于美的方方面面。回看他创作的生肖系列作品，那种



黄永玉90岁所画丈二荷花(局部)

属于他的智慧和幽默，不会随他而去。他会永远存在于20世纪的艺术史中，并且在21世纪艺术史的开篇中占有重要的篇章。

这个世界因为有了黄永玉先生，我们感觉到了精彩。我们也感受到因为他的离去，属于他的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在怀念他的时候，看看天上飘动的云彩，那种变化万端，正是他的艺术精华之所在。

展现中医传承化育心性的力量

——简析电视剧《后浪》的精神蕴涵

□戴清

刚落幕不久的电视剧《后浪》以清新朴拙的人物形象表现中医传承的厚重内容，新意突出，带给观众对中医传承、教育以及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思考。

编剧六六为完成《后浪》的剧本创作，花费多年时间攻读了中医硕士学位，为剧本实现中医传承的形象化表达、保证创作的专业化水平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医诊疗望闻问切、针灸、推拿、艾灸、中药等积淀深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剧作对这方面的艺术转化颇具功力，既接地气、自然流淌，又呈现出中医的博大精深。剧中对中医看病的特征，一言以蔽之为“看有病的人”，即是强调把人看作一个整体来综合救治，这恰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思维观与宇宙观。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孙头头，一个只有中学文化水平的外卖员、孤儿，跟随师父任新正在中医传承班学习了五年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中医传承人。这个故事显然带有一定的传奇性，整个故事就是孙头头这位“低模仿人物”（加拿大文艺理论家弗莱语，指境况低于观众的）逆袭史。故事的难度在于一般逆袭故事都是人物一步步历练、逐步提升，而这个故事却从一开始就直接把孙头头抬到姜氏针派传人的地位。

让传奇性落地生根是《后浪》的挑战，也构成其重要的叙事魅力，即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形下，正面揭示人物的点滴变化、展现教育改造人心的力量。起初孙头头颇为顽劣，从人物母题上看，这一形象颇接近混沌未开的“石猴”孙悟空，最初她的行为颇为荒唐，也伴随着很强的戏谑感：为钱来到传承班，迟到、上课睡觉、没大没小、抗拒仪式……仪式一向是文明的肇始与确立，剧尾孙头头领诵“大医精诚”气质端庄温和，由内而外的变化正是对她主动承担传承中医责任的最好说明，也见证了教育的伟力，恰如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名言所描绘的：“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教育之力，始自任新正（仁心正的谐音）这位大医的自觉追求，既是自己师父的嘱托，也发乎本心、知行合一。在任新正的身上，贯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之风，他对

头头的用心培养既有知识技能传授，更重心性化育与开悟。这一人物兼有大医和仁师的双重特质，厚重的师者形象近年来荧屏塑造成功的很少，观众在电视剧《大考》中有所领略，但人物的戏份却比任新正轻了很多。这一人物既是造诣深厚、悬壶济世的大医，也是身体力行教育传承责任、对中华文化与道统有着深刻体悟的理想师者。

任新正对孙头头的教化与改变是潜移默化化的，同时这种改造并不是单向的，她如一块璞玉，纯良正直，嫉恶如仇，讲义气、有担当，又绝不世故，恰如古人所说，她是“开心见诚，无所隐伏”的真人，更是“肺腑都无隔，形骸两不羁”的赤子。任（新正）师以真心真情厚待宽容头头，正所谓“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孙头头也必然以发自肺腑的虔诚对待师父，以全身心的热情传承中医。

同时，孙头头也有着得天独厚的天分与禀赋，这也是“低模仿人物”能够逆袭的先天条件，如超群的嗅觉味觉，惊人的记忆力，身手敏捷、直觉敏锐、性情大气、宽厚乐观、不惧压力，这一点在她和任天真的相形对写中有着鲜明表现。但同时，任天真与孙头头这对最终走到一起的年轻人其实又有相近相通之处，他们都是天真、真挚之人，可贵可爱，真切反映了创作者对中医、医者的整体定位与独特理解。

众人的历练与开悟。《后浪》对中医传承班学员的群像塑造十分成功，人物各有各的身心问题，整部剧既表现他们的成长修炼与自省开悟的精神历程，也借此强调了中医治病救人的整体思维观。如剧中杨小红（瑞贝卡）从一名精英律师换位为一位温暖中医，她有律师的伶牙俐齿，华服在身、自律自尊，但心性有时又是狭窄的。她与死去律师的妻子陈卉结怨，后又意外为陈卉接生，在这个由死到生的循环中，她获得了自己的新生，显示出中医传承班对骄傲心性的改变与启迪。

彭十堰从一个不信中医的西医卧底到逐渐改变刻板观念，成为一位接受中医、尊重中医的身体力行者，事实上回答了缠绕在中西医关系、中西医对峙上的诸多思考与追问。杨小红与彭十堰的欢喜冤家也为作品平添了几分喜剧色彩。

赵力权则从艰难草根的急功近利到陷入泥潭、作奸犯科，最终一度竟想加害恩师吴善道，好在良心犹存、停止作恶，但始终无法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怯懦自杀，所幸被任师和师兄所救，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最终投身到武汉防疫工作中重获新生。正所谓“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赵力权的新生同样彰显着中医传承教化人心、改造心性的力量。

任天真这个出身中医世家的硕士生，在杰出父母、祖父母的荫庇与期待下长大，备受宠爱、真诚善良，但又总是“压力山大”、自信不足，不时表现出敏感和脆弱。与孙头头相识，从最初交恶、对立对峙，到逐渐走近、发现对方的真率和美好，经过实践的历练，完成了他的蜕变，成长为一个有力量的仁心医者。

剧中幽默的阿公、气定神闲的阿婆恰似全剧的定海神针，又有着老前辈的气度与热情，他们对女儿、孙子、徒弟的开导温馨温暖，不经意间就透露出人生的智慧。这方面也通过全剧文化深厚的对白显现出来，剧中任师脱口而出的《素问》“内存正气，邪不可干”，再如“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及之理”等都令人回味无穷，又全无掉书袋之感，十分贴合人物身份。孙头头的台词也从最初的没文化到逐渐出口成章，显示出人物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微妙变化。

剧中医馆的多位病人也颇具代表性，是窥斑见豹的窗口，得见社会众生相与众多社会问题。比如丁简兮和母亲祝霞的绝望，程莹婚姻的重创与心理问题，提供了关于病患身心创痛的治愈与和解的艰难思考。再如许萌萌和父母的亲子关系则反映了当下某些家庭教育的失败：身为成功人士的夫妻二人看似深爱女儿，但又很少陪伴孩子，更无法接受女儿青春期的失足和创痛，粗暴的纠正最终导致悲剧发生，令人唏嘘。

当然，在中医科班教育的发展已然相当成熟的当下，《后浪》如能适当表现孙头头因半路出家而面对一些学业挑战，同时增加一些其他科班学员们在传承班上的优异表现，可能对全面呈现中医教育与中医传承更为客观有利。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博导）

5月26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电影艺术》杂志社、中共威海市委宣传部、中共荣成市委宣传部举办的“纪录电影《大洋追鱼记》研讨会”在京举行。

山东火龙文化公司继第一部《大洋深处鱿钓》2020年荣获金鸡奖最佳纪录片提名之后，又组织拍摄了第二部纪录电影《大洋追鱼记》，讲述印度洋上中国远洋渔民捕捞金枪鱼的故事。创作者将镜头聚焦于中国蓝色产业特殊的劳动者群体，呈现了印度洋区内中国远洋船员捕捞鱼的劳作场景和他们的情感世界。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张宏认为，该片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是立意高远。该片充分反映了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展现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敢于拼搏的民族精神，通过影像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中国故事的世界表达。其二是真实感人。这是一部真正基于生活、基于真实的艺术呈现，所记录群体的每一个人，都以可信的面孔直面镜头，叫苦不怕苦，叫累不怕累，为了家庭、为了美好生活去拼搏。其三是表达的独特性。该片进一步激发观众思考何为电影艺术、什么是生活，真正体会到人民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人民，人民是艺术之母。影片没有滔滔不绝的旁白，而是用客观镜头记录下旭日东升、惊涛骇浪。

据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程守田介绍，该片主创跟随着远洋捕捞渔船在大洋上漂泊拍摄近五个月，付出了很多艰辛，也冒着极大风险，真正体现出电影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惧风险以及执着的艺术追求和创作精神，向观众全景展示了中国现代远洋事业发展的崭新场景。在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讲好中国海洋故事，增强海洋文化软实力，是一个重要命题，相信此片对弘扬中国远洋人勇闯大洋的开拓精神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导演井建民谈到，在海洋上拍摄与在陆地上有很大不同，除了晕船、摇晃、噪音等因素，水雾、空间等问题也给拍摄增加了难度。为了拍摄最佳视角，团队还自行设计辅助工具，以期达到镜头预期效果。

“壮观、惊险、震撼”，与会专家对该片给予高度评价。有专家谈到，《大洋追鱼记》运用反对比等方式提高了影片的艺术张力，比如辽阔与渺小、波浪壮阔与风平浪静、五彩缤纷与灰暗寂寂、生活的枯燥与丰收的喜悦、前途没落与归心似箭、内心舒缓的情感与激烈短促的快感等，观众仿佛与渔民同行、同游、同劳动、同欢乐。

（许莹）

纪录电影《大洋追鱼记》

大洋漂泊拍摄数月，只为讲好中国远洋人的出海故事